



No. 2 2009

总第十期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2009年6月2日下午,《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一辑在复旦大学隆重发布,发起方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与文史研究院、丛书作者、出版方复旦大学出版社参会,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参加了发布会并发言。



2009年6月18至19日,由我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合作举办的“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文史研究院“复旦文史讲堂”第四十场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讲演、第四十一场东京大学大木康教授讲演现场。演讲摘要与视频请见我院主页 www.iahs.fudan.edu.cn。

目 录

《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一辑发布	2
杨玉良 在《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3
葛兆光 关于《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编撰情况的汇报	5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7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要旨	8
 求异还是趋同：谈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	15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18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六至十一）	
蔡忠宪 山神与佛教——从僧传对山神的形塑看佛教传布	21
李妍承 韩国近年的中国学研究	22
朱 奕 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文献——大英图书馆所藏犍陀罗语《法句经》	22
杨俊峰 封赐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	23
许全胜 读汉景云碑——兼谈汉代美术	24
杜春媚 世界史视野下的辜鸿铭	24
 新书介绍	26
外刊撷英	28
博士后论坛	
永远的成吉思汗：读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31
应激与自省：晚清民初文话发展的新路向	32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09.04—2009.06）	33

《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一辑发布



《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一辑：

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著《比较文学研究入门》
复旦大学戴燕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
中山大学康保成著《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
四川大学周裕锴著《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上海社科院芮传明著《丝绸之路研究入门》
上海社科院钱杭著《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

2009年6月2日,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共同发起并组织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文科硕士研究生编写的学术入门指导丛书《研究生学术入门》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当天,复旦大学为该套丛书的出版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

该套丛书中的每本入门书,都邀请一位学界知名学者,就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撰写,并在体例上作统一的规定,要求包括四方面内容,即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回顾、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取向、

研究典范个案的介绍以及参考阅读文献的推荐。其编撰目的是为了给刚进入硕士研究阶段的学生提供基本的研究方法的指导,并循序渐进地引导其进入更专深的研究阶段。该套丛书从2007年开始编撰,预计出版30种左右,涉及的内容涵盖文、史、哲三大学科的诸多领域。本次发布的是该丛书的第一辑,共六种。其余各种将在以后陆续推出。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并就研究生教育培养问题作了讲话,葛兆光教授也代表组织编撰方发表了讲话。



在《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好!

我很高兴有机会出席《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的发布会。首先我要感谢丛书所有的作者,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我们今天就欣赏不到这些好书。同时我也要感谢研究生院和出版社,我觉得大家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天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我现在还兼着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一职,当然这个亲切感使得我有时候会有些错位,因为我同时又是复旦大学的校长。

学位办在2007年初召开的第二十三次学位委员会会议决定:今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培养质量。为此,由学位办组织,会同劳动人事部对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质量作了一项大规模的深入调查。调查的样本数超过100 000个,调查内容涉及博士论文、课程教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等。调查采用实证性研究手段,不预设任何先验性假设条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三十年来,采用自己培养和海外引进相结合的方法,造就了一支优秀的导师队伍,加之其间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日益优越的条件,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的质量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不容否定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调查结果也发现,我们还存在一个低质量的“尾巴”,这个尾巴还不小。虽然,从统计情况来看,总体质量在不断提高,但就是因为这段低质量的“尾巴”把整体的水平拉下来不少。

针对这个情况,学位办一直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生的教材问题。关于研究生教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对于理工类、医学类来讲优秀的教材较多,而且认为理工类的研究生教材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不太相信这点,许多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实际上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标准。因此,即

使是理工类也还没有太多标准的研究生教材。

对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材来讲,问题就更大,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文史哲方面研究生教材建设则更显薄弱。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到了研究生阶段,教材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至少不像本科阶段那么重要。朱自清就说过,剑桥大学的教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教授抽着烟斗,学生就这样被“熏陶”出来了。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但那只适用于教授的学生人数很少的情况。在朱自清的那个时代,情况确实如此。那时,即使是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等那样的大科学家们,一辈子也仅培养几个或十几个学生而已,那种“熏陶”的培养方式是合适的,而且这种培养方式对少量尖子人才的培养尤其适合。然而,当今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硕士生)的规模很大,要保证规模培养研究生的基本质量,仅按原来的老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教材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应该传统的“熏陶”方法和高质量的统一教材双管齐下才能既保证基本质量,又能出尖子人才。

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发动力学理论,构成一门学科有几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有三点:第一是大家提到的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教学生,如果不讲历史的话,学生就会认为好多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无从判断这门学科的前沿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就很难找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其次,一个学科有一些基本的学科基元(matrix),包括一些基本原理、基本定律、重要的公式和研究方法等等,由此构成这个学科的基本范式(paradigm)。第三就是一些典型的研究实例。学科的这些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一本教材的基本要





素,学生就是通过这样的教材来学习这门学科的基本范式。我觉得,这套研究生的教材正好符合了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因此,我相信这套教材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有一个看法,即教材和科普书最难写,一个优秀的学者不见得能写好教材和科普著作!为什么现在好的科普著作和教材大多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我认为,就科普著作的写作而言,不仅要求作者对科学理解要很精到,还要有文学水平,否则写出来干巴巴的,没人要看。除此之外,还要求作者有非常高的哲学水平,并通晓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历史,否则科普图书是写不好的。对自然科学有此要求,对人文社科也不例外。对科普著作尚且如此,对教材则要求更高。

撰写教材则不仅要了解学术,还要熟悉教育理念和教学的基本方法。教学方法的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需要实践经验,某一领域的专家并不一定是教育教学的专家。就像马克思说的,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只有当一个学者具有教学实践的经验,才能把一本教材真正写好。这套教材的编著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并大多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这些作者都为编写这些教材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们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完成了这套教材。我相信,这套教材将对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培养和学术研究都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大学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长期思考。

教授们编写的教材的水平也反映了这所大学的水平。世界许多著名教材出自剑桥、牛津、哈佛和 MIT 这样的一流的名校。因为,学术底蕴不深的教师和学术氛围不佳的学校是出不了好教材的。例如,有一本著名教材《物理化学》,牛津大学 2006 年出版的时候是这本教材的第 8 版,而且还一直在修订,可谓与时俱进,

千锤百炼。我们大家都要认识到,教材是着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性工作,若不认真做好,我们就无法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再者,当今世界的印刷物多得出奇,网络上的信息也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卷有益”就成为一句谎话。人们花在对图书优劣的甄别上的工夫并不亚于真正的阅读。因此,在这种印刷物和信息泛滥的情况下,怎么样出一套精雕细琢的书非常重要,尤其是出一套精雕细琢的研究生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套新书的发布会,我感到所发布的不仅仅是一套丛书,而是我们对当今研究生教育的一个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思想的宣示。现在我们把这个理念付诸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跨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张隆溪教授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我是先拿到的,我粗略地读了一遍。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适用于文史类的研究生阅读,而任何对文史的学问有点兴趣的人,就像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它也是一本极好的入门书。所以,我觉得它的作用和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生的教材。高水平的作者写的书,一定可以让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去欣赏它!

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研究生,当然不仅仅包括研究生,甚至是研究生的指导教师,通过这些教材来学习前人是怎么做学问的。人的时间有限,如何读经典和精华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对文史类的青年指导教师,我相信这套书同样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我也希望媒体的朋友们能认真、到位、客观地来宣传这套丛书,使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最后,我祝贺《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的发行成功,再一次谢谢丛书的作者和专家以及我们学校的教师、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还有研究生院和出版社。

谢谢大家! □



关于《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编撰情况的汇报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杨校长,各位媒体的朋友,我代表丛书的策划群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问题,想讲一下这套丛书编撰的背景。

两年多以前,我们一些学界朋友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研究生教育的缺陷和问题,尤其是人文学科,我们觉得,也许这个缺陷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改变,但是也可能进行一些调整和改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尤其是刚刚进入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尤其需要被关注。那么,现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指导和教学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有三条:

第一,我们始终感觉到有的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有一点儿像戏班和作坊,把学生当内弟子,以前有一句流行的话说,研究生可以用烟斗熏出来,我向来觉得这方法不太可靠。因为这就会使得老师会什么就教什么,可是,老师会什么就教什么,没有个规范和方法,学生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有点像复印机复印一份东西,越复印就越淡,以至于最后什么都没了。也就是说,老师的领域是一亩三分地,到了学生四个人分一亩三分地,一个人四分都不到,再下面学生带的学生,如果是四个,可能连一分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问题,人文学科是不是能用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带?

第二,很多指导教师不太能够分清研究生跟本科生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本科生和研究生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研究生应该教什么?还是大学常识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研究生的教科书,于是,我们对研究生的教育始终缺乏一种非常自觉和明确的概念,很多老师都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由于人文学科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恒定的标准来判断好坏。因此,在各个学校、各个导师下,学生的知识结构、研究水平往往不一致,有的学校有的导师好一些,有的学校有的导师指导的学生可能水平就差一些,还有的导师觉得,我应该培养天才,不必严格和死板地要求。我非常反对这些想法,为什么?

天才不是老师的事,保证底线才是老师的事。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套东西,但这套东西又不是大学教材,它跟大学教材有一定的区别。我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大学生主要是要学常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常识,

硕士研究生是要学习一套研究方法,而博士生是要给他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这是我提出的三个层次,就是常识、方法和视野。因此,我们想到是不是能够编一套讲方法的书,为硕士一年级编的书。过去老话说,教会了学生饿死了师傅,现在恰恰是教不会学生才饿死师傅。以前,禅宗有一个故事叫“指月”,“指”是语言文字,“月”是佛法真谛,禅师老是说,你要看月不要看指。可是,中国也有一个故事叫“点石成金”,我们给学生的,恰恰不是点石成金的“金”,而是要给一个点石的“指”。所以,我们编撰这套《研究生学术入门》的目的,就是给刚刚从大学生阶段进入研究生阶段的人,给他一个方法,这就是我们这套书的来源和背景。

第二个要向各位报告的问题是,这套书编撰的基本方法。

我们看了国外的研究生、大学生的一些入门书,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选编,把优秀的研究范文选一些,或者把重要的参考文献选一些。第二种是概论,就是把这种领域的大概情况说一下,就像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牛津学术入门”一样。第三种是综述,是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综述。

我们觉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套书的基本体例。我们采取的是三方面的组合。第一,这个领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领域前人做过





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研究史或学术史。我想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两句话，如果你不做研究史回顾，你既无法避免剽窃之嫌疑，也无以使人知道你比别人多做了什么。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求作者有一部分精力用在叙述学术史，使我们的学生知道你必须、也可以踩在前人的肩膀上，要做一些超过前人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生，包括导师，在这点上自觉意识不是很好，他不知道别人做了什么，还总以为是自己别出心裁、率先发明。第二，我们希望在书里面给研究生介绍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说，这个领域里面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哪些？这样就使得研究生能很快进入照猫画虎的阶段，虽然照猫画虎这个说法好像是有讽刺意味，但是，照着猫画大概是个虎的样子，如果照着虚无缥缈画的话就画成了鬼了，“画鬼最易”呀。所以，我觉得模仿，尤其是模仿好的，是硕士一年级的研究生进入学术之门一个很好的途径。当然，我们希望各位介绍一下最好的研究典范，像张隆溪教授介绍的杨周翰、钱钟书就是公认的最好的。这样，可以取法乎上，如果取法乎下，我们就不知道底线何处了，所以我们希望取法乎上，哪怕仅得其中。第三，我们要求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书目或文献目录，我们

知道，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学校藏书条件不一样，一些边远地区的大学也招研究生，可是他们的藏书条件差一些，如果开出一些必读论著，他也可以去寻找、去参考，这就超越了他本身学校和导师的限制。另一方面，参考论著实际上也是一个视野，让他知道外面的学术世界有多大，有多精彩，这就是一个视野。如果能开出一些精深的，甚至博士生都可以看的进阶文献，那就更好了。这样，不管有没有名师指导，他都能够拥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和视野。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三个词，第一个词是历史，第二个词是方法，第三个词是视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一打精深的著作，也比不上一本合格的教科书，因为我们太多的人需要教科书的指导，教科书的影响不能说好和坏，至少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很多学者实际上是在教科书影响下进入学术之门的，这是又悲哀又无奈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在很长时间，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人们认为一流学者不要写教材，认为一流学者写教材是降低身份，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我恰恰认为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我的介绍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东亚海域的各个民族、国家及其各自文化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交流、冲突和互动？彼此之间的观察和想象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东海在历史上看起来有时宽阔，有时拥挤，有时又很静谧？我院近日举办“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对东亚文化交流史的回顾和探讨，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2009年6月18至19日，我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三方合作举办的“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高知大学、天理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近20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学术研讨。

众所周知，东亚各国环绕在东海、黄海周围，历史上藉由这片广阔的海域展开过频繁的交流，各种政治、宗教和文化在这一空间里交错，形成了一幅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场景。但以往学术界针对东亚历史进行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各国的国别史，比如将历史上的中国、日本、朝鲜分别作为研究的单位，这样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东亚海域”这个历史空间里各国因相互间的交流而形成的某些跨越国界的历史场景。而我们知道，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

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涌现出来。

本次研讨会重在跨越国别史的界限，以东海为中心，将包括东海及周围大陆在内的地理空间里发生的历史作为考察对象，以历史上的三个百年（1250—1350, 1500—1600, 1700—1800）为时间维度，探讨该空间、时间范畴内发生在东亚海域的交流和互动。通过这样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学者们将东亚海域世界的多层性、多样性及它随时代的转变而经历的变化充分表现出来，同时，学者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为近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作为一体的世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会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正教授就“东亚海域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做了主旨报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以“西域与东海”为题阐述了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其他与会学者则分别围绕“开阔畅通的海”、“相互竞逐的海”、“分别共存的海”三大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全程参与研讨会并做了大量点评。最后，整个会议在精彩的观点交锋和良好的学术互动氛围中圆满落幕。□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要旨

《东亚海域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羽田正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海域世界这种说法源自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我们将这种概念进一步地系统化。通常意义上的海域世界将大海置于视野的中心,同时包含周边的陆地。我们将海域世界作为一个研究的空间,有以下两个研究要旨:一是发现发生于这个地理空间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二是对这个空间具有的与其他地理空间不同的共通特征进行把握。但这个地理空间所涉及的范围会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我们可以设定各种各样的空间,每一个时代的空间一定会有许多层面,这些层面重叠在一起,层面叠合越多,这个海域世界的特征也就越明显。层面的广度和大小并不是确定的,因此海域世界的周边范围也不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说,海域世界并不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其内部具有一定的固定形态的、单一的、封闭的空间。很多人认为“民族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但现在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我认为

对民族国家史的描述方法应该加以重新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域史具有与民族国家史相对应的积极的作用。

《西域和东海》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在中国学术史上,西域的研究是促使中国学术走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从晚清到民国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期间中国的学术能走向国际化并有了新的方法、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实际上都与西域的研究分不开。东海和西域一样都很值得关注,但是西域研究和东海研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在立场、理论与方法上的不同。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与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



而“近世东海”周边诸国,很多文献原本均由汉文书写,各种宗教学说大体共享,文献资料多有印刷流传,因此,对于新语言、新发掘、新资料的依赖并不是那么强。但是,近世东亚海域研究却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二是研究者如何改变过去习惯于“同文同种”的历史观念,细心剔理各自“古层”和“低音”中的差异;三是近代诸国都遭遇到西方的冲击,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在回应西方“冲击”时各国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现代性问题。

《环境的作用——环海的日常生活体系》

冈元司 广岛大学文学部



东亚地区濒临海洋的仅限于东亚的东部及东南地区,这一地形上的特色决定了海洋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中所占的比重较轻。但是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也因地域而异。在华北,与海洋河流的关系是局部性的。而在华中、华南,利用河流、水路、海洋的航路非常发达。特别是东南沿海大区域对海洋的依存性很高。日本列岛的所有区域都被海洋包围,特别是九州的地理位置朝向东海,与海洋的关系十分密切。东亚的农业到了唐宋时代,稻作的范围逐渐扩大,这一变化促成华中、华南、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列岛的经济的发展。而地域开发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技术随之成为东亚各国交流的重要内容。而由自然环境所导致的各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人口分布的不均,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会造成疫病的高发,这刺激了医学的进步,医学亦成为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东亚海域这个空间,从自然的到经济的、社会的,再到文化的联系在不断深化。

《东亚海域世界史的海洋环境》

吉尾宽 高知大学文学部



布罗代尔《地中海》中有两段很有意思的话,一个是“荣光的天空”,夏天的三个月围绕地中海的交流十分繁盛,那个时候是“荣光的天空”;还有一个是“可怕的季节”,受到由北面吹来的季风的影响,地中海各国的港口一起关闭。自然环境对围绕海洋的人的活动的活动在东亚海域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七至十八世纪东亚海域,在以黄海为中心的朝鲜海峡周围的海域,存在着连接日本博多、长崎、对马,朝鲜西岸,中国的登州、莱州、宁波等地的航路;而在东海的中央地区,以宁波—博多航路为主线,最南限有福州—那霸航路,此外还有五岛到舟山、福州等地的航路;东海东部有流求到萨摩的航路,这个海域即黑潮存在的海域;台湾海峡存在连接中国江浙地方和长崎、五岛的航路,以及连接台湾和南海诸国的航路。途经这些海域的人们会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利用季风来航行。而利用季风航海,还必须要考虑到海域海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东亚大海的认识,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各个时期人们对各海域的称呼也随着他们对其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与地中海域四周被大陆包围所形成的海域世界不同,东亚海域的东部因黑潮的存在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边界。因此,海域环境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将东亚海域历史的研究导入“作为一体的世界历史”。

《南海与东海

——以人物研究为例谈跨国史研究》

杜春媚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我的报告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上东海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行性与重要性,第二是谈一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南海、南洋交流。关于跨国史对于



理解东海范式的意义,我同意葛兆光教授的说法,在国别史和超越民族国家之间要有一个平衡。在历史上,许多人物的活动一方面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在每个具体的环境中又无时无刻不受到这种环境的制约。至于我们说超越民族国家、跨国史,只是提供另一种可供使用的范式。目前的整个世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但也有世界史、全球史等跨国史的研究,跨国界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开发一些过去在狭窄的国别史中难以或无法很好研究的课题。像奴隶贸易、传教士活动、殖民主义、移民、离散等这些课题本身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超出了今天所界定的文化宗教的区分。只有在跨国界、跨文化的新模式下才可能进行更有效的研究。

《开阔畅通的海》

向正树 大阪大学



1250—1350 年间,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东亚海域可以用“开阔畅通的海”这一特征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不存在海域权力的尖锐对立,领域权力对海域的支配是相对的。这一时期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空间的广阔性,领域权力对海域的管理相对柔软和舒缓,民族的构成与交流更加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幅度超过了前代。当时活动于东海和南海海域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公家性的、与官方有关的,如官方使节、宗教人士及与政权结合的商人;二是当地的集团;三是域外的,在东亚海域,有汉人、日本人及朝鲜人混合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在南海,有汉人、穆斯林、土耳其人等。通过分析他们的活动,可以看到许多当时亚洲海域圈发展的新动向。比如银锭在中国、中亚

以及伊朗西部的使用,说明了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的连动。另外伊斯兰教人员的流动,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从物质流动的方向来看,明显看到双方的互动在增强。中国人爱好的物品通过大海向周边地区传播,这期间作为“交流窗口”的浙江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 ——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

陈波 南京大学历史系



我主要讨论收于朝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中的六则文书,所记事件的时间跨度是自万历二十六年底到三十三年(1598—1605 年)。这六则文书的内容都是关于中朝之间漂流人的送还,涉及漂至中国的朝鲜渔人、漂至朝鲜的明朝海防军人、被倭寇掳掠然后又随日本商船下海的被掳人,并且牵涉到下海贸易的日本商人及葡萄牙人,几乎涵盖了漂流人的各种类型。这些人作为滨海居住的人群,易于接触来自异国的不速之客,常常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东亚诸国的贸易活动,并面临漂风或被掳等不可知的遭遇,是游移于国家体制内外的边缘人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具有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所谓“境界人”的种种特性。此种习惯于跨国生存的“境界人”的频繁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东亚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模糊了国家权力和族群认同的边界,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与之伴生的诸如海盗横行、反政府势力聚集、违禁品输入、异己宗教传播等不安因素,促使东亚诸国不约而同地自固樊篱,先后采取一种加强贸易管制、限制人员往来的闭关锁国式的对外政策。

《相互竞逐的海》

中岛乐章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

以明朝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在 1500 至 1600 年间



发生了许多变迁,尤其是作为亚洲贸易中心的明朝,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其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形态,经历了从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一体化的“贡市一体”,到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并存的“贡市并存”这样一个转换过程。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经历了形成期、最大期、缩小期、动摇期、解体期这五个阶段,在1560年代末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我将之概括成为“1570年体系”的这样一个贸易体系。在“1570年体系”下,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与朝贡无关的互市贸易的比重都在逐渐增大。东南和西北诸国与明王朝进行物资交流的途径有所变化,也就是被我们称为“东南的弦月”(海域)和“西北的弦月”(陆上)两个部分。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都存在着朝贡、互市、往市、密贸易等几种形式,明朝根据与贸易对象的关系,开始采取多样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当时对白银的需求量很高,围绕白银展开的贸易不仅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造成了影响,而且由此导致了世界各地的白银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制品也大量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

《纷扰的海域与错杂的日本像》

朱莉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以往学术界针对东亚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往往都从国别史的角度出发,与域外国家的交通是这些国家政治系统的一个环节,从这种思路延展开去,与其他国家通过海域展开的交流就成了一国国家政策的衍生物。但如果放眼于更久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陆上国家的政策决定了它们通过海洋进行的

交流,而恰恰是通过海洋的交流决定了陆上国家的形态。这种交流对于东亚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革以及文化的走向、宗教信仰的传播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东亚诸国间的互动带来了相互认识的改变。明代,由于倭寇横行,中国人的日本观由原先美好的印象变成了凶恶狰狞的倭寇之国。通过对明代政史类资料、民间文学以及研究日本专著中相关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可知明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和态度既因群体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又存在着某些共性,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较之于前代对于日本的关心程度大大提高;二是能够直接与日本人发生接触的社会阶层增加了,但他们对日本人的认识尚停留在直观的、想象的、非理性的阶段;三是明代兴起了对日本的研究。但这是在倭寇这一特殊事件刺激下的应激反应,而非中国人对外认识自然发展的产物,因此依然不具备自发性的自觉,从而未能真正开启中国人对日认识之先河。

《分别共存的海》

藤田明良 天理大学国际文化学部



从17世纪中叶起至18世纪,随着东亚政治秩序的稳固,完成内部统一的东亚领域权力(近世国家)垄断了交通海外的权力,东亚海域出现了各国分别共存的状态。在上一个时代由各社会集团参与的海上自由贸易被国家管制的、由行商负责的定点贸易所取代,对人员往来的限制也空前严厉。这个时代来往于东亚海域的人员主要是外交使节、商人和漂流民,各国与外国人的交往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域,而与其他的地域相隔离,这是当时存在于东亚各国的一个共同特征。虽然东亚海域各国在政治方面是受到严格管理的独立世界,但在经济方面,东亚海域和东南亚海域是互动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东亚海域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与其他海域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易也摆脱了明代“非贡不市”的朝贡贸易框架,转向了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互市体制”。于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成为了18世纪东亚海域交通的主要内容。这种交流不仅改变了东亚各国的产业、贸易结构,也改变了相互认识,更主要的是促进了各国自我意识的增长。总之,18世纪的东亚海域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政治外交联系相对冷淡、经济文化交往相对密切的图景。

《隔离的政治体和交错的文化圈 ——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 和东亚海域的交往》

张翔 复旦大学历史系



1644年明朝灭亡——即“华夷变态”,造成日本对作为明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构成了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学派的兴盛。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强调:荻生徂徕通过批判朱子学的自然秩序与社会规范的本质性关联,而主张圣人创建制度的主体性的近代意义。但是丸山的观点无法解释近世后期,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儒学的普及化和官学化的历史意义。丸山以后日本学术界对此的长期研究揭示出:因为天明、宽政时期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民众反叛,促使幕藩体制重新确立了朱子学作为武士和一般民众道德规范和秩序重建的基本原理,来应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日本幕藩政府的官僚化,武士和一般民众的道德教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推进了日本社会的东亚化,这是近世日本进入东亚儒教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标志。原来的日本锁国体制发生一定程度的松动。开始避开国家之间的华夷体制的纠葛和纷争,主张形成以通商作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另外,虽然幕府并

没有完全消除对满清的疑虑,但是也逐渐产生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萌芽。

《十八世纪东亚海域国际交流中的风俗记录 ——兼论日、朝对盛清时代中国的 重新定位及其社会反响》

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使得东亚各国渐行渐远。但是到了18世纪,随着清王朝进入鼎盛时代,东亚邻国对于清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面对着日益强盛的大清帝国,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亦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大清国”和“靺鞨子国”,分开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应对新的形势而作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十八世纪中国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此一时期,中、日、朝三国的交流极为频繁,这种相互交流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且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在中国,日本的洋铜、宽永通宝以及其他的东洋货大批流入,其中的宽永通宝泛滥,曾引发官方的强令禁止。而在日本、朝鲜,大批书籍以及其他商品的流入,既形成了两国的“慕华”心态,同时也导致两国中一些人担心国内的文化认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达到了顶峰状态,故而在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证》和《雅言觉非》等书,力图拨乱反正。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 与自身的新认识(17—19 世纪中叶)》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18 世纪西方力量的渗入使东亚海域原有的格局和意识观念发生了改变。导致 18 世纪日本人形成新的对外认识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他们与当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商人、技术人员的交流;二是这个时代日本人在海外的直接体验;三是西方人所带来的新的地理观念。这三个因素引起了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认识的变化。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中国认识的变迁,其次是对亚洲、尤其是

东南亚,建立起了新的认识,再次是对欧美认识的发展。至于日本对自身的新认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一般的日本人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 identity。而西方人到来以后对日本正面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日本人,使他们觉得自己在亚洲应该能与中国人并驾齐驱。山村昌永、箕作省吾等人的著作都开始抬高日本的地位。确实,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意识”或是“日本人情结”以及西洋先进的观念,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即 18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凸现出来的。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的到来以及从西洋输入的新知识,尤其是描述整个世界的相关地理知识,无疑是酿成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它与明治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也有相当的内在关联。□

朱莉丽 整理



復旦文史講堂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求异还是趋同:谈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复旦文史讲堂以学科交融的视角,探寻传统文史研究的前沿发展,尤其注重展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的中国视境。自2007年3月以来,已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了四十一场学术讲演,成为复旦学子接触学术前沿的窗口。本期刊出最新两场讲演摘要,以飨读者。



张隆溪教授讲演现场



大木康教授讲演现场

求异还是趋同： 谈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

演讲人简介：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2009 年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中西文学及文化的比较研究。著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走出文化的封闭圈》、*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等。



在比较研究中，究竟应该注重差异和事物的独特性，还是强调契合与事物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问题，一个基本的阐释角度，也是研究者常常遇到的问题。

中国古人早已讨论过同异以及与人的基本感觉之间的关系。孟子主张人性趋同，所以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杂多与统一的关系，认为不同成分调和起来，才构成事物和谐之美。《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

《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两种说法并不互相矛盾，而是强调的方面不同，二者相辅相成。这点上，西方人的认识和中国古人有许多相近之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相反者相成；最美的和谐（harmonia）乃由相悖的事物构成，一切都在争斗中达于一致。”这种辩证关系在西方美学中是一个重要原则。由此可见，差异与契合，事物的独特性与普遍性，本来是相反相成，在比较研究中，不应该偏于一面而忽略另一面。所以脱离具体的情境，抽象地说应该趋同还是应该求异，是没有意义的。



许多研究的意义在于界定某一事物的特点,需要注重这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独特性和差异。所以求异自有其价值。从文学作品的细节来讲,每一首诗、每一部小说都是独特的,都不同于其他的诗或小说。然而独特并不是完全不同于其它作品,独特到不可与其它任何作品比较的绝对程度。从文类和文学的总体说来,不同的诗或小说又有共同特征,形成一个文学传统,表现出这个传统共同的总体特征。

不过就比较文学而言,问题是不同的文学传统是否有共同点和可比性?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里借明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常用的说法,明确肯定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就肯定了中西文学和文化之间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有可比性。然而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不少人强调文化传统独特无比”,尤其认为中西文化之间有根本性质的差异,没有可比性。强调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有根本差异的人,往往不是停留在这类具体的差异上,而是强调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上有根本差异,而所谓根本差异是说互相之间毫无共同点,也就没有跨文化理解的可能。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讲演,讲完后讨论提问时,听众当中就有一位说:中国人讲天人合一,西方人讲人定胜天,二者根本不同。可是“人定胜天”并不是西方人讲的,而是中国古人提出来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人可以战胜天,或者人可以征服自然,而是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中,人的因素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超越天时地利环境条件的局限。所以“人定胜天”与“天人合一”并不绝然矛盾,讲的都是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为西方人对自然只是一味利用和榨取,那是简单化和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偏见。其实在最近数十年里,正是西方社会和学界首先开始讨论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天人合一”往往被误解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合一,人和自然形成和谐一体的关系,而且认为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古代固然有这样的思想,但那不是儒家,而是道家的主张,是陈寅恪先生所谓道家的“自然主义”。汉儒董仲舒讲的“天人合一”绝不是什么人与大

自然合一,而是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把‘天’作为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作为“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按照董仲舒的阐述,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为人间的政治权威提供神圣的合理性依据。在这个理论系统里,权力的运作是井然有序的,而这种秩序以儒家典型的论证方式,把家庭人伦关系作为政治理论的道德基础。

董仲舒说:“身犹天也”,把天人格化,使自然与人显出各种对应的关系,由观察具体有形来理解抽象无形的“天意”和“天道”。只有通过正确解读自然现象的符号,人才可能见微知著,了解天意。懂得观测天象又能对之作出解释、向帝王提出建议者,当然就是有知识有学问的儒者,于是董仲舒这套“天人合一”论,也就为确立儒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天上日月星辰发生的变化与人世相关,而且可以影响人世,这的确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观念,可是这一观念,或我们现在称之为星象学或占星术,却绝非中国所独有。以观测天体星象来了解上天的意志,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里都是一件大事。“神给我们视力,其目的是让我们得以观察天意的行动,并将之运用于近于天意的人意之举动。”这听起来和董仲舒的意思很接近,但说话的却是柏拉图。在古代,观测天象、记录天体运行,目的往往是为占卜。英国学者罗界(Geoffrey Lloyd)教授考察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希腊对天象的观测,发现在这三种文明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信念,即“上天发出与人的命运相关的信息,不是决定他们的命运,而是作为警告,引起明智的人注意。”这和董仲舒所论完全一致,因为他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可见在古代希腊和中国,都有以灾异为上天谴告的观念,这令人惊讶的相似使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天体与人体的对应、自然与人世的对应,即所谓“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都不是只在中国才有,而是在西方从古代到中古、直到十八世纪甚至之后,都可以找到的。

西方一些研究思想史和文学批评的名著,如亚瑟·罗夫乔伊(Arthur Lovejoy)著《万物之链》和蒂里亚



德(E. M. W. Tillyard)著《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像》,都曾详细讨论过把自然和人世视为一个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相互感应的世界这种“综合性”的世界观。也许相对而言,西方“万物之链”的观念有更系统的宗教意义,但在中西文化中,天与人、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相互感应就把世间万物都彼此联系起来,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经说,法国人似乎特别喜欢把西方之外的文化想象为与西方不同,具有异国情调。这当然不只法国人如此,美国人和西方其他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人把中西文学和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例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讨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之所以不成功,就认为归根结底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人根本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中国语言没有系统的语法范畴。这里所下的判断并不是针对个别词语,而是对整个中文的性质和能力所下的判断,并且是由此对整个中国思维模式和中国人思维能力所下的判断。

当代法国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更可以代表这种将中西对立的观点。他反复论说同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在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没有接触,所以也就可以在与希腊的对比中,显出西方文明真正的特点。由异己的文化来反观自己,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于连预设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其论证的前提往往决定了他研究的结果,于是他在著作中几乎连篇累牍地论证一系列中西文化的对比,而这些对比往往引出极其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结论。例如希腊有哲学,中国只有注重实用的智慧,希腊有真理观念,中国人不讲真理,只注重实际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求异和趋同本身并不是研究中的真问题,比较研究必须注重具体问题和具体的论证前提,以此决定具体情形下同与异的意义和价值。同不等于完全没有差异,异也不等于完全没有一点相通和可以比较之处。这就是比较研究的一个基础。□

唐勉嘉 整理摘录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演讲人简介

东京大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文化。著有《中国近世小说入门》、《中国明清时代之文学》、《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冯梦龙〈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等。



近年来明清的出版文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八十年代先有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的大作《从理学到朴学》,日本的井上进教授在2002年也出版了一部《中国出版文化史》。另外,在美国有包筠雅(Cynthia Brokaw)教授、贾晋珠(Lucille Chia)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还有英国的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他们都发表过中国(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出版文化研究。我也研究过明清时期的出版情况,分析当时出版业发达的原因,讨论出版业发达导致的社会变化等问题。最近,我意识到出版只是有关书籍的一部分,而书在出版之后,究竟是怎样到读者手

上?这就牵涉到一个所谓的“流通”的问题。

我选择“流通”这两个字,而不叫“传播”,是因为如果叫传播的话,除了说书本身到了另一个地方以外,还有作品的内容怎么影响到了其它地方的意思。我主要关心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书,所以选择了“流通”这两个字。

为了全面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先按照中国古籍的三种出版形式来分别讨论:一个是官刻,一个是家刻,一个是坊刻。

首先是官刻本的流通。官刻就是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出版品。明代嘉靖年间周弘祖有一部



《古今书刻》，上编以地域为单位，记录了当时官刻书的目录。其中刻书最多的是南直隶。有点奇怪的是福建，除了“官署”，不知为什么还有所谓的“书坊”。

清代的材料更加丰富，翁连溪先生编的《清代内府刻书图录》中《清代内府刻书概述》的第三部分，整理了五种清代内府刻书流通的情况，即呈览用书、陈设用书、赏赐用书、颁发用书、售卖与流通。其中，颁发用书是中央政府颁发给地方政府和学者作为样书，让他们依式翻刻。而最有意思的是“售卖与流通”这一方式，就是一般的销售。据说乾隆初内府刻书由崇文门监督处负责出售，乾隆九年还在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立了通行书籍售卖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尽管不是商业出版，可是当时的内府刻书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到达一般读者手上。

还有一个资料，出自明代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其中《内板经书纪略》，是明代内府出版的目录。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这说明宫廷中的人也喜欢读《三国演义》这样的书，而宫廷刊刻这类书也是出售的。

其次是家刻本的流通。首先可以注意的一个材料，是清代焦循的《刻〈诗品〉序》：

往岁仁和胡学院（胡高望）督学扬州，以“隔溪渔舟”命题。去秋乡试诗题又命以“晓策六鳌”。于是友朋就余索观，而门人子弟辈复请写录而习诵之，甚苦其烦。闻旧时坊间有专刻本，问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习诵者取之便耳。可见，首先有抄本的流通，然后要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雕版印刷，印刷就可以同时有很多复本流通，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地上本没有路，走了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抄本到刻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后来《红楼梦》的情况就是如此吧。

下面再看看《儒林外史》第八回中的如下一段：

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駙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

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

虽然是小说中的情况，但是家刻本基本上是这样的，刻好之后分赠亲友。我研究的冯梦龙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比如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就有冯梦龙和其他人赠书的记录。还有有意思的情况，是祁彪佳写过一封信给冯梦龙，内容如下：

三吴为载籍渊丛，凡为古今名贤所纂辑著述者，不论坊刻家藏，俱烦门下哀集其目，仍开列某书某人所刻，出于何地。庶藉手以披获数种，聊解蠹鱼之癖，拜教多矣。诸不一。南都近日新刻有足观者，望并示数种之目。（引自徐朔方《冯梦龙年谱》“崇祯三年”条）

信中祁彪佳请冯梦龙编一个当时新刊书的目录，一定写明书是谁刊刻的，在哪里出版。大概接到这个目录后，他再给冯梦龙写信，要订购哪些书。我想，作为藏书家的祁彪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当时的新书吧。

家刻本还有一种功能是用来交换。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有“《文则》二卷”条：

顷吴书估从东乡太仓来，携此求售，乃明弘治刻，想去元板未远，因以家刻《国策》易之。盖书不多见，索值白金一两六钱，视毛估钞本价已倍之矣。

黄丕烈自己刊刻了很多书，所以用自己刊刻的书来交换新的书，这既是一种丰富自己藏书的办法，也是家刻本的流通形式之一。

再次是坊刻本的流通。我经常使用的下面这条《桃花扇》里的资料，是关于南京秦淮河附近的三山街的书店的。三山街就在孔庙和府学之间，贡院的附近。它就像现在的学生街吧，所以在那里集中了很多书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凤凰阁〕（丑扮书客蔡益所上）……〔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稽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现在，大部分的出版社跟书店是两种类型的单位，可是当时，就像蔡益所的书店，它一边卖书，一边出书，是书店的老板另一方面又在出书呢，还是出版社的老板另



外又在卖书呢？哪一个为主，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蔡益所书店“兴南贩北”，可见是全国性的书籍流通。这方面《儒林外史》中也有相关的材料。第十八回提到杭州的文瀚阁书店的老板托匡超人批一部八股文的选集：

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

这里的“客人”，应该就是所谓的书籍批发商吧。书店在杭州，可是从山东、河南来的客商，他们会到杭州来批发杭州出的书，所以杭州书店的老板很关心他们的行程情况。

还有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说到：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

北京本来出版的书比较少，可是全国各地的好多书都集中到北京来。为了考科举，为了当官，又有很多读书人都到北京来，他们都要买书，所以全国各地的书都到北京来，这样的全国性的流通，客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除了客商和全国性的流通，还有在一个地区内的，特别是在江南一带的较小范围流通，起中间作用的有“书友”和“书船”。清代苏州的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提到他也通过书船买了不少书，比如《普济方》：

初，书坊某云，书船有残宋本《普济本事方》，……昨，书船之友携来各书，俱无惬意者。（卷三）

很有意思的是黄丕烈想要买什么书，他对哪一方面的书感兴趣，这些“书船之友”很快就来了，他们信息的流通比书的流通还要快。

黄丕烈还通过所谓的书友来买书，提到“书友闻之杂沓而至”等等。这些书友对书的了解十分详细，像学者，却又是商人，就像现在的 broker 吧。黄丕烈是很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可是看清代江标为他编的《黄尧圃先生年谱》道光五年条：

是年先生开滂喜园书籍铺。襄事者为懋堂（段玉裁）老友。

似乎他还自己开了书店。如果在日本的话，学者和书商或者出版社是完全分开的，可是在中国的明代清代，有许多学者自己开了书店，或者自己出版，就像黄丕烈这样，这是中国的学界和日本的学界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关于明清时代书籍流通的问题，应该还有很多要收集的材料和研究的方面。今天我没有谈到佛教、道教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佛教和道教有善书的出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日本江户时代书籍的流通，主要在通俗小说这类，租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江户时代很有名的《八犬传》，就有很多人租来看。中国的明清时代有这样的状况吗？我非常粗浅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请多多指教。□

华蕾 整理摘录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六至十一)

山神与佛教——从僧传对山神的形塑看佛教传布

蔡宗宪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博士后、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山神在此指中国本土的山神信仰,佛教则是传自印度的外来宗教,两者在信仰内涵上有相互冲突之处,然透过长期的互动,两者之间也产生包含、融合的现象。僧传作为一种宗教文本,佛教本位的立场相当明显,也带有藉高僧言行以宣扬教化的意图,因此,僧传对于山神的形塑,可以视为佛教主观地融合本土信仰的一种象征。在不同阶段,山神亦呈现不同样貌,反映出佛教传布过程的不同面向。

中国中古时期,既有的祠祀信仰由于加入佛教和道教的因素,民众的宗教信仰活动显得相当活络,亦趋于复杂。山神信仰为传统山川神信仰中的一支,除了五岳、四渎、九镇这种全国性的官方祭祀体系外,各地方的民众也发展出本地的山川神信仰。春秋战国以来,山川神有一个人格化的重要转变,此变化使山川神的身份、形貌与活动有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可以与佛教教义对话的媒介。

首先,虽然春秋战国以后山神即已有人格化的趋向,不过,山神的形象并不是很清楚。相对于此,僧传中的山神形象显得较为鲜明,常描述形貌特征,并透露出家庭、社会背景的讯息。最重要的是,山神经过僧侣的感化后,亦懂得布施、舍宅、护持,甚至受戒皈依,俨然一副佛教徒的风貌。僧传中如此描述山神的性格、

身份、形貌与服饰,及与僧侣之间的互动,究竟塑造出何种形象的山神?这种形象的背后具有什么世俗或宗教的意义?

其次,早期的佛教经典中,山神为自然神之一,虽亦可变幻人形、兽形,但山峦精灵的属性似乎较强。僧传中的山神则吸纳了中国本土山神信仰的元素,并从佛教立场重新塑造山神的形象。早期佛典与僧传的山神各自具有哪些特点?两者间的差异,或可用来观察佛教传布的轨迹,探索佛教中国化的特色。

其三,透过对山神形象变化的解读,也可对应佛教的传布与发展。山神暴烈的情绪,象征着自然灾害的无常,后经僧侣的传教点化,山神皈依,戒绝腥膻,遂风调雨顺。诸传说是否具有地域性?如以南方低度开发地区为多。《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分属不同时代,对于同一处山神的记载,是否有延续性?随着佛教的普及,特别是禅宗盛行以后,僧传山神的形象是否有明显的转变?

总之,尽管僧传具有强烈的佛教色彩,内中的山神描述不可遽视为本土山神信仰的真貌,然这项史料的特点却能反映佛教内部对于外教信仰的态度。透过僧传对于山神的形塑,可以反观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



韩国近年的中国学研究

李妍承 韩国首尔大学哲学教育事业团研修研究员、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是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等)可比,因此,韩国学者并没有把中国学问完全对象化。韩国的中国学必须和韩国的国学(即韩国学)联系而理解。历代中国文化是韩国文化形成的源流之一,韩国的汉学研究可以说是韩国创造自身文化的过程之主干。然而作为一个地域学概念的“中国学”的名称从1980年代才开始普遍使用,从此以后很多大学设立了中国学系和研究所。以当代韩国学界对“中国学”这一概念范畴的共识而言,有时把“中国学”翻译成 Sinology(汉学),有时亦翻译成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前者被认为是前近代的老一套学问,而后者比较偏重于实用性与政策性的研究。地域学概念的中国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的文史哲研究之间仍然有点距离,不过“中国学”概念逐渐涵盖有关中国的所有学科。

韩国汉学研究的传统,被日帝强占期抹煞民族文化的政策以及韩国战争所破坏,传统汉学的命脉几乎断绝。因此,当代韩国的中国学可说是肇始于1950年代,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一,1950至19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缺乏客观性。当时的中国学主要是中国文史哲研究,难以接触大陆方面的资料。二,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韩国学界逐渐关注中国大陆,尤其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韩国的中国研究机构竞相成立。三,90年代初期

到现在,两国建交后,交流日益频繁,韩国的中国学氛围更加浓厚。

最近韩国的中国学界跟着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趋势,热衷于国际化,一方面强调英语表达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招徕外国学者任教或做研究员。另外,有关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资料主要是借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已有的电子档,也设置学术经典文本的电子档和韩文翻译本。这使得学术研究的便利性大增,当然也稍稍影响了研究主题及方法。

这十几年来,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韩文中学术概念的重译过程。西方概念通过日语或者汉语的翻译融入韩文的语境,于是很多概念和原来西方的意义已经不同,而且同样的汉字在东亚三国经常有不同的含义。必须提到的是从1990年代初期,韩国的中国史研究阵营开始热烈讨论东亚。从1995年始,西南财团出版了东洋学术丛书,2004年又出版了《从周边看东亚》。首尔创批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有关东亚的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03年的《东亚的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 of East Asia* (vols. 1-6))。

最近中国哲学界出现努力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而探讨东亚思维的特性。韩国的传统思想一直和中国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为了解韩国固有的思想性格,必须理解中国思想。

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文献——大英图书馆所藏犍陀罗语《法句经》

朱奕 英国牛津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候选人

《法句经》乃二千多年前佛陀唯一亲身口传相授之教义,其在佛教教义中地位之重要性,如《论语》之于儒教。《法句经》共有梵文《Udnavarga》、巴利文《Dhammapada》、中文《法句经》、《法句譬喻经》、《出曜经》、《法集要颂经》等。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犍

陀罗语《法句经》(故名:伦敦版《法句经》)堪称世界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

伦敦版《法句经》成书年代为公元一世纪早期,大约公元10至30年间,由大英图书馆于1994年在阿富汗东部 Hadda 附近的沙漠中发现。正是由于大漠之地



的特殊地理与气候环境提供了犍陀罗语《法句经》完好封存近二千年、如今得以重见天日的机会。在发现藏有伦敦版《法句经》的陶罐中共有 29 件桦树皮残片写本,包含大约 23 篇犍陀罗语文献。通过该《法句经》残卷与梵文、汉文和巴利文的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之间的影响与传承,而差异处又反映了时间、地域、部

派对此的作用。这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已由大英图书馆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于 1998 年合作组建的早期佛教写本研究小组(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陆续整理出版。它与 1892 年于中国和田发现的和田版《法句经》交相辉映,打破了巴利文《法句经》独霸一方的局面。

封赐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

杨俊峰 台大历史所博士候选人、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有关宋代祠祀信仰的研究已经累积大量的成果,但是有一类特殊的祠庙(旌忠庙)过去很少人关注,这些官方色彩浓厚的祠庙,往往披露统治者主动涉入祠祀信仰的企图。本报告试图探讨旌忠庙出现的历史,梳理赐封与旌忠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脉络。

大约在两宋之际,朝廷透过立祠与赐额的手段树立若干旌忠庙,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首度以比较大规模立祠的方式传布核心的政治价值。宋世以前,除了建祠奉祀特定的忠臣外,有的皇帝(如唐玄宗)亦以树立各种历史人物典范的祠庙,展现儒家治国的政治理念,而忠臣之祀也厕身其中。两宋之际,国家树立旌忠庙的思维则与此不同,此时朝廷和士大夫官僚,立祠追祀当代忠臣烈士,以挽救政权存续的危机,本身即是积极的政治行动的表现。

具体而言,何以两宋之交,出现赐封劝忠这种新手段,涉及两个问题:一、朝廷赐封劝忠的政治意图为何?二、赐封民间祠祀的措施,如何演变成宣扬核心政治价值的手段?

第一个问题涉及旌忠庙的措施与南宋初期政治史的关系。作为新的劝忠活动,旌忠庙比较集中于南渡初期兵荒马乱之际,在朝廷和士大夫官僚的推动下,立祠追祀逐渐成为重要的旌忠手段之一。在诸多表忠的措施里,旌忠庙有一项独有的特色:向四方宣扬忠义价

值的作用,而且是以常民熟悉的祠祀形式进行宣传。由于不满朝臣于两宋之际失节的表现,在忠义价值沦丧危机感的驱动下,出现一波重建忠义文化的活动,而旌忠庙作为新形态的劝忠活动,实具有向常民百姓进行思想动员的效果,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进一步而言,南宋初期立祠赐额劝忠,系奠基于北宋大量封赐措施的经验而来。封赐活动大盛后,统治者认识到封赐手段能将政权和地方社会紧密结合。同样的,透过御赐庙额,皇帝褒扬烈臣的措施也可以在基层社会表现出来。有了旌忠庙的桥接,皇权、忠义之行与地方社会三者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新的劝忠手段具有更大的思想动员的能量。

两宋之际的旌忠庙,预示祠祀作为积极政治行动的一环的时代到来,旌忠庙的出现,说明官方积极操作祠祀以为政治价值之载具。这种态度发生在大量封赐祠祀信仰之后,显示官方在大幅涉入祠祀信仰之后,反而受到牵引,开始以祠祀劝奖核心的政治价值。而且长远来看,这些措施的出现,不是宋廷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管制信仰的意图所致,赐封成为旌忠的元素,最初的动力是南方地区推崇神祇的传统推衍为一代通制所致,这是一段自然推移演变的历史,同时也体现唐宋之间,南方本地力量崛起后对近世国家祠祀政策可能的影响力。



读汉景云碑——兼谈汉代美术

许全胜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汉胸忍令广汉景云碑》于2004年3月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发现于重庆市云阳旧县坪汉晋胸忍县故址。碑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通高240厘米,宽95厘米,厚22厘米。隶书,13行,行30字,共367字。此碑是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汉代历史、文学、美术、书体演变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碑铭解读方面,报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需要辨证之处。如碑文起首径写卒年之例,尚有云南昭通和帝永元八年(96)《孟孝琚碑》、四川郫县顺帝永建三年(128)《王孝渊碑》、山东济宁汉安二年(143)《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等。

又如,铭文“先人伯沘(或释作“沘”),匪志慷慨。術禹石紐,汶川之会”,有人据《国语·鲁语》“杼,能帅禹者也”,以为“伯沘”即夏王“伯杼”。更有学者据汉晋时期“禹生石紐”的传说,认为大禹是羌族人,生于今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北川境内一线天崖壁上的虫篆体“禹穴”二字可能是伯杼回蜀寻宗所题等。报告据灵帝中平二年(185)陕西合阳《曹全碑》、中平三年(186)山东东平《张迁碑》等汉碑文中追叙先人之例,指出《景云碑》之“伯沘”绝非夏代人,应是汉代人,而将大禹考实的种种论定皆是无根之妄谈。报告还特别强调“汶川”二字音读在社会上已习非成是,其实

“汶”即“岷山”、“岷江”之“岷”,应读 mǐn,不当读作 wèn。

景云碑碑额中央司閤者半开天门之形,左右又分别刻仙人、朱雀,碑侧左右则有龙虎图像。这种图像组合可与四川芦山县石羊上村所出汉建安十七年(212)上计史王晖画像石棺作比较。石棺前端即仙人半开天门图,棺之左侧有浮雕青龙,右侧为白虎,后端有玄武像。景云碑虽无玄武像,但推测原应有龟形碑座,这样便正好合成四象。

景云碑与王晖石棺时代、地域均较近。这种人物启门图像除见于石棺外,还广泛见于东汉时期四川的石阙及山东某些汉墓画像石,后世各种考古资料中所谓“妇女启门”图像即来源于此。北魏洛阳石棺、唐代佛塔、五代宋辽金墓内建构、石木棺槨、宋元画像砖上都能见到这类图像。而景云碑则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例,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景云碑》还是研究汉字书体演变的重要标本,可与东汉晚期方笔书法的代表作《鲜于璜碑》(延熹八年165)、《张迁碑》(中平三年186)等作横向比较。西南地区碑体书风变化较缓慢,《景云碑》的书风为著名的《爨宝子碑》体(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找到了源头,填补了书史发展史的重要缺环,弥足珍贵。

世界史视野下的辜鸿铭

杜春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叙述中,辜鸿铭通常是以一个极端保守主义代表的形象出现。过去的辜鸿铭研究讨论的内容也集中于文化保守主义为核心的问题,比如说辜鸿铭是否真的保守?有多保守?以及他与各类不同保守主义者的异同等等。评价上大多局限在先进/保守,反动/进步的范式中。我认为这些研究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承袭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西方/中国,新/旧的脉络,有一些局限。

本报告的一个目的就是试图跳出五四现代主义的范式,超越新旧、中西的对立,同时以跨国、跨文化的方法研究辜鸿铭。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试图跳出民族国家的限定,不将辜鸿铭局限在中国/西方,中国人/非中



国人,中国性/西方性等本质化、绝对化的对立概念中讨论,而是把他放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精英的群体中,对于他的人生轨迹、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且讨论他跟出生地、英国和“中国”三地关系之间的张力。我使用离散华人(diasporic Chinese)的概念,论证当时离散精英所谓的“回归祖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职业发展在殖民地受到局限导致,不能低估功利性因素在他们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当时离散华人精英的回归也呈现出各种形态:从暂时到终生移居,从纯粹的工作需要到政治和文化的完全认同。

第二,并不预设辜鸿铭在政治认同上一定是“中国人”,不预设他在文化认同上一直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不认为辜鸿铭的中国性(Chineseness)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为一个在英属殖民地出生长大,从小受英文教育、没有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的海峡侨生,辜鸿铭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加以概括。

他在思想构造和身份认同方面是多元共存的。他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总的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而内地受到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和他本人对于西方社会理解的影响。

辜鸿铭受到欧洲浪漫主义对于现代化批判的深刻影响,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观点与反现代化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批判。辜以他所理解的儒家经典为材料,以欧洲浪漫主义思想架构为核心,想象、构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救赎。辜鸿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既超越了欧洲浪漫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又和其他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于殖民主义的反对有所不同。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尽管长时间以来辜鸿铭在西方是作为中国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但是从思想根源、读者受众、活动范围和交游网络等方面来看,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文史研究院在“复旦文史讲堂”之外,另举办一系列“小型学术研究会”,主要由我院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作专题报告并参与研讨,本期刊载的是最新六场报告会的主旨摘要。)

新书介绍

• 《从周边看中国》(“复旦文史专刊”第一种)



按照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说法,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标志,是“从天下到万国”。从以自我中心想象天下的“华夷观”中走出来、打消了盲目自大的近代中国,却逐渐养成了以西方为背景审视自身的习

惯,“中”和“西”(或者“东”和“西”),中国一方面习惯地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代表,一方面开始把“西方”作为认识自我的唯一镜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无论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中国始终都是在西方这个尺度中被观看的,美丑妍媸,都来自那一面镜子。不过现在想来,尽管镜子相当清晰,但我一直在想,恐怕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

“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话题和这次会议就缘起于这样的想法。2006年下半年,当我接受复旦大学的邀请,来上海主持新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我一直在想,如何用好现有的资源,追随当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和中

研历史语言研究所,办一个多少可以实现某些学术理想的研究机构,当时我觉得,清华国学院和史语之所以成功,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在研究领域上介入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第二,不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它也建立了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第三,得益于“天时地利”,所谓天时地利,是说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这些使得清华研究院和史语所在当时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当时我提出,希望以“从周边看中国”这一主题,来推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因为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说到,“从周边看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文献上可能会激活相当多过去不曾重视的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资料,在方法上也会刺激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八十年前,傅斯年创立史语所时曾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就是学术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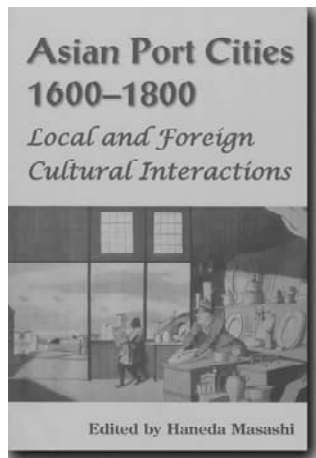
正是缘于这一构想,2007年12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讨论



会。在这次气氛相当热烈的会议上,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贡献了三十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记录,也涉及了异文化之间的彼此想象和观感,还包含了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涉的方法论,它们既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交涉即异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更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的自我认识史。现在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收录的就是这次会议上各位学者的论文。

(摘自葛兆光教授所作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6月出版。)

- 羽田正编《1600至1800年的亚洲港口城市: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会》(*Asian Port Cities 1600-1800: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s*)



17、18世纪,亚洲的港口城市曾是不同文化交会之地,所涉及的人群极为多样化。在此背景下,港口城市的商人怎样与异国人沟通?当地官员又如何管理和掌控商人的活动?该书对比欧洲东印度公司曾开设过贸易中心的若干亚

洲港口城市,超越了国别史的界线来检视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比如,借助荷兰人和日本人在长崎跨文化交流的丰富史料记载,该书不仅探讨了建筑、商业、艺术往来、贸易争端,还涉及家庭问题、服饰、住房,以及其它社会关系。

书中收录的十篇论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对亚洲港口城市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一,东印度公司在港口城市开设工厂的地点、所有权及建筑特色;二,从翻译者的角色来看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交流;三,贸易方式的比较;四,欧洲公司所开设的工厂与当地之间冲突和事端的法律解决;五,外国男性和当地妇女之间的关系,以及混血儿童的社会地位;六,港口城市中的文化交流,即对于外国服饰、食物、技术、艺术、思想(包括宗教思想)等的受容或者拒斥。

此外,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书中采用了“海域世界”这一开放、松散的地理概念。从海域世界的角度来看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受某一特定国家限制,来研究国家历史的叙述,也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它为史学家提供了观察、分析和综合各种跨文化交流,及政治权力对多元经济、文化活动之影响的试验场。该书对亚洲海域世界的全新阐释,对于研究欧、亚前近代历史和物质文化史也有一定启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教授编《1600至1800年的亚洲港口城市: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会》,新加坡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外刊撷英

- 《五台山文殊信仰和王权——对唐代宗时期金阁寺修筑的分析》(五臺山文殊信仰と王権——唐朝代宗期における金閣寺修築の分析を通じて) 中田美繪, 東方學, 第百十七辑, 2009 年

八世纪中叶,对于五台山文殊菩萨(中国山西省)的信仰热潮不断高涨,不仅是来自唐朝国内,而且是来自印度等国外的巡礼活动持续进行。到了九世纪以后,日本、敦煌、辽、西夏等地,以五台山文殊堂和小五台山为模本,纷纷建造“拟似”五台山,从而使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东亚全域得到传播。五台山文殊信仰繁盛的始作俑者是代宗时期君临长安佛教界的密教僧人不空。他把五台山文殊信仰推进为国家事业,不仅整修五台山上的寺院,而且在全国寺院设置文殊院、树立文殊像,使之成为全国规模的信仰。不空活跃的八世纪后半期,支撑唐朝的律令制被破坏,这就需要建立新秩序的理论。对于代宗而言,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吐蕃的数次入侵,使他时刻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他试图恢复失落的皇帝权威,迫切地希望重建国家机器。所以,当时的政治状况和五台山文殊信仰的高涨不无关系,文殊信仰被寄予了张扬皇帝权威和期待国土安宁的政治意愿。不空最初推广文殊信仰的契机就是着眼于金阁寺的修筑事业,他把代宗放在转轮圣王的位置,通过修筑金阁寺,构建有关文殊菩萨的理论,将皇帝和五台山文殊信仰相结合,这是一种基于佛教的王权思想的新创造。

- 《唐代诗僧和六朝僧》(唐代詩僧と六朝僧) 傍島史奈, 日本中國學會報, 第六十集, 2008 年

唐代是中国佛教在本土独自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诗作兴盛的时代,文人们频繁地赶赴寺院题诗,咏叹包含佛教教义的诗文,并将很多诗文寄送给佛教僧人。通观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诗文,特别是盛唐以后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与支遁(约 313—366)、慧远(334—416)和惠休(南朝宋)相关的诗文数量很多。三位僧人活跃的六朝时代,入华佛教中大乘和小乘的区别还不是很明显,两者都有为数不少的信徒,同时,佛教是儒、佛、道三教中唯一的外来信仰,所以当时人们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教(格义佛教),后来,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于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开始形成。中唐以后,以江南为活动中心、被称为诗僧的佛教僧创作了大量诗文,他们对上述三僧的记述非常多,通过分析诗僧们咏叹三僧的诗文,可以考察当时诗僧们的立场和心情。

- 《中唐唱和文学的展开——通向〈刘白唱和集〉之道》(中唐唱和文學の展开——《劉白唱和集》への道) 橘英範, 日本中國學會報, 第六十集, 2008 年

在白居易(772—846)和刘禹锡(772—842)的唱和诗集《刘白唱和集》中,所收入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四类:唱和、赠答、竞作、联句。中唐时期,创作唱和诗的趋势非常明显。《刘白唱和集》中所收的刘、白两人



的作品的时间是以大和、开成年间为中心的,不过,大历时期浙东、浙西文学集团创作的唱和诗和联句、元和初期韩、孟创作的联句、元和年间元、白持续创作的唱和诗,对刘、白两人的影响甚大。有关刘、白的唱和诗以及中唐唱和文学的文献数量很多,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本文追述中唐时期唱和文学的源流,在这个源流中,刘、白的唱和文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本文试图作出一些解释。

- 《浙东的礼学——万斯大〈学礼质疑〉的世界像》(浙東の禮學——萬斯大《學禮質疑》の世界像) 松崎 哲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六十集,2008 年

清代浙东学发端于黄宗羲,并以标榜实事求是而闻名。浙东学和考证学有一定的相承关系,那时产生了章学诚、万斯同这样的卓越思想家。一般而言,浙东学是重视史学的学派,而万斯同除了史学之外,礼学的造诣也很深。而且,他的兄长万斯大也留下了《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学礼质疑》等与礼学相关的著作,成为浙东学派中知名的礼学家。万斯大在《学礼质疑》的序言中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认为“义”是本质的东西,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但他同时认为,“三代而降,圣人不作,礼制废阙,义固不明,数亦难考”,“先儒立说,不能贯通,……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所考虑的“礼”是对一个贯通的整体世界的记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学礼质疑》从第二卷开始所述的内容主要是曆、祭天、宗庙、宗法等。研究从曆到宗法的相关议论,可以了解万斯大内心广阔明朗的世界,也可以显示清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

- 《再看早期的禅宗:道宣,达摩和三阶教》(Another Look at Early Chan: Daoxuan, Bodhidharma, and the Three Levels Movement) Eric Greene, *T'oung Pao*, Vol. 94 (2008)

作为最早的有关达摩的记录,道宣的《续高僧传》在研究早期禅宗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道宣试图提升达摩的谱系,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他实际上在攻击达摩和其后来的追随者。该文认为,这种解释和理解是不正确的,道宣实际上是攻击

隋代僧人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的追随者。三阶教在界定禅宗含义方面的作用,在七世纪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赞同。

- 《生命形式:生物拟态遭遇佛教在鲁迅身上的体现》(Life as Form: how Biomimesis encountered Buddhism in Lu Xun) Lydia H. Liu,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umber 1, 2009

生物科学和宗教(如佛教)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许多哲学问题,本文将侧重于其中之一:形式是否可以植根于生命? 作者认为,随着欧洲进化生物学的传入,中国的文学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诸如其他技术的生物拟态技术,来处理“生命形式”这一问题。围绕鲁迅早期对于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和科幻小说的兴趣,尤其是他翻译的《创造人类的技术》和他的引起佛教徒广泛关注的叙事小说《祝福》,文章力求把这些和鲁迅生平、作品有关的来源澄清,以便更进一步理解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争论是如何在现代中国展开的。

- 《一个英雄恐怖主义者:重新认识荆轲》(A Hero Terrorist: Adoration of Jing Ke Revisited) Yuri Pines, *Asia Major*, Vol. 21: Part 2, 2008

公元前 227 年,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以失败告终,招致了秦国的野蛮报复。尽管荆轲失败了,但他死后的荣耀却可以和始皇媲美,成了许多文人笔下的英雄。荆轲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恐怖主义者? 本文将证明实际上他兼而有之。他被高度评价不是由于他的行为符合道德或具有正义性,而是恰恰缺乏这些。文章分析了整个帝国千年中对荆轲不同形式的纪念,阐明了他的行为所带来的负面评判。本文的目的不仅要说明中国传统中英雄主义和道德之间的分歧,而且也要强调在政治文化中重要的反等级潮流。结尾对当今纪念者要保持传统的悖论——即一方面敬佩荆轲,一方面也认识到他的行为的道德模糊性——的难度做了简短的分析。



- 《大宗族、官僚和地方巨头：中国晚唐时上层社会的构成和变化》(Great Clansmen, Bureaucrats, and Local Magnates: 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 Nicolas Tackett, *Asia Major*, Vol. 21: Part 2, 2008

中国上层社会有过一个重要模式,即一些“大家族”能够将其社会地位保持近千年,并同时主宰政府官僚机构。这个模式随着公元十世纪唐朝的没落而消失,取代他们的是一个新的非官僚学者阶层。本文讨论的是:大宗族如何存在那么长时间,唐朝之后是什么原因引起新阶层的出现。一种新近可以使用的资料来源就是出土的墓志铭。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墓志铭的主人,主要生活在黄巢起义之前。借助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实证定义,即上层社会享有更精致和高贵的墓葬,墓葬特点主要体现在墓志铭上。本文将提出以下几点:到晚唐时,在确保国家的政治重要性方面,比大宗族更加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都城家庭中所拥有的成员资格;是否能成为政治方面的上层人士和是否入住都城有很大关系;在社会和地理的变化融合中,一种经济上的非官员上层人士开始出现在非都城地区,为了当地的利益,他们甚至可以成功地与官员家庭抗衡。

- 《迂腐的书呆子! 谯周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地位》(Rotten Pedant!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fter-life of Qiao Zhou) J. Michael Farmer, *Asia Major*, Vol. 21: Part 2, 2008

温斯顿·杨(Winston Yang)认为:在中国,读过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人要比读过陈寿《三国志》的人多。本文指出,《三国演义》是一本小说,因此其中有一些杜撰的成分。本文研究的核心人物是谯周。谯周是一

个正典和历史方面的著名学者,是蜀汉时的一名官员。历史资料把谯周描写成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蜀汉的坚定支持者,《三国演义》却很少谈到谯周的学者才能,而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可以解读天体、预知国家兴亡的宿命先知。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对谯周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历史记录,树立了他在未来的名声。本文的研究将探讨《三国演义》如何把谯周从一个正典和历史方面政治嗅觉灵敏的学者转变成一个体现小说道德寓意的文学形象——也正是这一点,使谯周变成了一个为后来的学者、政治家和普通大众厌恶和嘲笑的对象。

- 《秦朝的用刑和主观意识》(Notes on Penal Ritual and Subjective Truth under the Qin) Charles Sanft, *Asia Major*, Vol. 21: Part 2, 2008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秦朝的法律是残酷的、严厉的,然而历史记录传达的仅仅是一般的,有待确认的信息。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县的睡虎地出土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记录,这些给研究者提供了很重要的关于秦朝用刑的新信息。本文认为,出于对形势紧迫性的一种形式反应,秦朝法律的施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罗宾·耶茨(Robin D. S. Yates)几十年前就指出秦朝的文件记录表明了一种超越官僚理性界限的管理方法,即调查程序。这些调查程序坚持了秦朝的公平思想,消解了秦朝法律由于过分关注犯罪主观意识方面引起的消极可能性。本文主张秦帝国的普通百姓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注意到这一点,官员更会如此。□

姚建根 李慧玲 摘

永远的成吉思汗

——读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姚建根

美国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所作《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之形成》(*Genghis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2004),该书是作者经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广泛参考各种历史文献而写成,给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历史以新的阐释。

这位日后被称为成吉思汗的男孩叫铁木真,是在一个充满阴谋的世界中成长的,他并未俯首于命运的安排,他成就了自己。作为一个破落家族的孩子,铁木真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他被遗弃在草原上,在整个孩童时期遇到的人大概也不会超过几百个,就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年复一年,铁木真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蒙古草原上的所有部落为止。

蒙古军几十年间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强势人物的征服规模都要大出两倍以上。这一成就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人。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悲剧。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时死于巴比伦的神秘氛围之中,其部下将他的家族满门抄斩,把他的领土全部瓜分。朱利叶斯·恺撒,在罗马元老院被贵族同僚和先前的盟友出卖,又在会议厅里惨遭毒手。拿破仑·波拿巴,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颠覆摧毁之后,沦为阶下囚,被关押在地球上一个遥远而又闭绝的无人岛上,痛苦地

寡居独处,孤单地面对死亡。然而,成吉思汗,这位年近七旬的君王却是在自己营帐内的床上坦然离世的,亲密无间的家人,终生可信的战友,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全都守卫在他的身旁。

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长河中永远的“焦点”。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不仅表现于他在世时所发动的无数次跨地域征战,更表现在后世人们对他及其帝国毁誉参半的评论。欧洲人起初对蒙古这一陌生部落的来临充满恐惧,而在“和平世纪”实现后,西方人对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产生了无比的敬仰和崇拜。就在斗转星移之间,西方的欧洲沐浴到了近代文明的曙光,而东方的亚洲则仍然在古代历史的藩篱中蹒跚而行,于是,新一代西方人摘去了他们前辈赋予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光环。与此同时,亚洲的民族主义者要论证成吉思汗的伟大,从而实现本国乃至亚洲的独立、复兴。因之,犹如成吉思汗这样一位能在不同时代引起人们广泛兴趣和关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在全球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成吉思汗是已逝去的真实历史人物,然而他的影响却波及今日之世界,“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他们的活动不能根据详尽的时间表来解释。”的确,在历经数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后,成吉思汗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姚建根为我院博士后

应激与自省:晚清民初文话发展的新路向

 慈 波

晚清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中西之争出现了明显一边倒的“醉心欧化”趋向。中学在这场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在国学沦亡的现实忧患面前,传统文话内部开始出现新的动向,中西学争成为人们思考的预设前提。这首先对传统的继承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国学的文化意义也得到空前重视,文章则被提升到维持文化命脉的高度,反映了国人应对西学冲击时的文化焦虑。

国人如此强调文章的功用,实在是因为西学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化太过剧烈。在西潮激荡的氛围中,国学伴随着衰颓的国势,开始淡出人们的关注视野。为了避免文化沦丧的结局,士人因应西学的最直接措施就是起而与之抗。但是毕竟运会转移,海通的大势无法逆转,新名词甚至新语言都渐渐渗入日常生活,一味简单排斥已难以奏效。文话中的相关思考反映出人们对西学的复杂态度,他们既对传统文章的新变抱有一定程度的宽容,但对西学又具有潜藏的戒心。

但是仅靠抵斥西学是否就能够使得传统国学焕发生机?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对西学的回应也需要审慎的考虑而非简单拒斥。在本土特色鲜明的文话当中,西学渗透的痕迹也开始加深,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开始了交流与融合的尝试。它提示了中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向,借助异域文明的深度思考,传统国学在审视自身的同时也努力探索新变的可能。这样,对西学的接纳就由初始的比附向深入发展。对中学本质的体认与对西学参照的探索都已达到新的高

度,“中学—旧学”与“西学—新学”这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开始变动,对传统内部的关注逐渐取得独立地位,西学开始以学术研讨客体的身份步入中学领域,两者的借鉴与融通成为可能。

在西学影响文话发展路向的同时,文话自身的思考也在积极展开。经历过一味排斥与醉心欧化两重境界之后,时人对西学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以往在斯文凋敝之际备受关注的经世之学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中学自省的重要方向。对于中学本身的自省是在西学刺激的情势下展开的,有了西方的参照,这种自省的深度与视野就拓展了很多。

在因应西学之际,原本内部观点并不一致的中学作为回应方,具有了共同的对象与目标。作为一种文化生存策略,传统内部在自省的同时意识到集中力量应对挑战的必要,其内部分歧变得不再突出。文话中原本存在的众声喧哗现象也渐为统一的声音所取代,这其中关于文章派别的争论以及骈散的区分尤为明显。

从晚清民初文化氛围而言,传统面临的挑战来自西潮的侵入与中学内部对传统的颠覆。西学的强势渗透使国人充满国学灭绝的焦虑,而新文化的崛起又勾起对国粹难存的深层担忧。传统自新的步伐因这双重冲击而加快,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因应西学以应激、反观本身而自省成为文话发展的新路向。□

慈波为我院博士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09.04—2009.06)

• 2009年4月2日

我院组织第十次博士后论坛,慈波博士作题为《应激与自省:晚清民初文话发展的新路向》的报告。

• 2009年4月3日

《解放日报》刊发题为《城市生活的文化演绎》的报道,介绍日前我院葛兆光教授、台北中研院李孝悌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在“解放论坛”上有关城市生活史的谈话。

• 2009年4月8日

我院刘震副研究员为复旦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史翼社主办的“经典的形成——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系列讲座作题为《“如是我闻”到“如是我见”——佛经是怎样产生的》的报告。

台湾中研院博士后研究员蔡宗宪博士来我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课题为《中古时期的山神信仰与佛教》。

• 2009年4月19日

刘震副研究员赴北京参加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和谐西藏对话:历史、现实与未来”系列学术对话会。

• 2009年4月21日

访问学者蔡宗宪博士作题为《山神与佛教——从僧传对山神的形塑看佛教传布》的报告,我院许全胜副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六场。

• 2009年4月23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芮传明研究员应葛兆光教授的邀请,来院商谈建立“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的具体事宜。

• 2009年4月24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应邀访问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并为高丽大学中文系学生作题为《中国文学文献学入门》的学术讲演。

• 2009年4月25日

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应邀参加韩国中文学会2009年度国际学术大会,并提交题为《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朝鲜铜活字本〈史记〉初探》的论文。

• 2009年4月

刘震副研究员的课题《以藏传佛教经典〈出家经〉为线索的佛陀“前传”整理与研究》获复旦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项目资助,该课题后又获“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资助。

● 2009 年 5 月 3 日—4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和“杜威学校”》。

● 2009 年 5 月 4 日

我院访问学者、韩国首尔大学李妍承研究员作题为《韩国近年的中国学研究》的报告,我院王鑫磊助理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七场。

● 2009 年 5 月 5 日—7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赴贵州省贵阳市参加第四届国际阳明文化节执委会主办的“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 500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提交论文《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表述》。

● 2009 年 5 月 5 日—11 日

葛兆光教授和王鑫磊助理研究员赴韩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学术交流,此行旨在推进与韩国同行研究机构间的学术合作。期间葛兆光教授一行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院院长金东淳教授等会谈,磋商合作出版《燕行录选编》事宜。5 月 6 日,葛兆光教授在成均馆大学东亚学院作题为《近年的中国学界为何关注思想史?》的讲演;5 月 7 日,葛兆光教授在梨花女子大学作题为《为什么要在东亚认识中国?》的讲演;5 月 8 日,葛兆光教授在高丽大学作题为《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中叶李朝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的演讲。

● 2009 年 5 月 8 日

访问学者蔡宗宪结束在我院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完成了《山神与佛教——从僧传对山神的形塑看佛教的传布》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5 月 12 日

我院召开工作例会,葛兆光教授通报了日前韩国之行的主要行程和活动,李星明研究员传达了杨玉良校长召集的平台基地负责人会议的主要精神。

● 2009 年 5 月 15 日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杨俊峰来我院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访问课题为《南宋初期立祠赐额劝忠的活动》。

● 2009 年 5 月 20 日

《光明日报》发表记者庄健对我院“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会议的报道,题为《日常生活史:从城市地图到清明上河图》。

● 2009 年 5 月 26 日

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朱奕在我院作题为《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文献——大英图书馆所藏之犍陀罗语〈法句经〉》的报告,刘震副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八场。

● 2009 年 5 月 27 日—29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陕西奇人王微与奇书〈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 2009 年 5 月

我院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承担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古代中国移民与东亚世界的形成”完成,成果《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承担的国家“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日本、朝鲜古代基本史籍的校勘与研究”成果《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一书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复旦学报》2009 年第 3 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发表葛兆光教授的论文《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 2009年6月1日

《中国青年报》就《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的编写对葛兆光教授进行专访。

• 2009年6月2日

由我院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共同发起并组织编写的《研究生学术入门》第一辑六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天,复旦大学为该套丛书的出版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杨玉良校长出席发布会并发言。《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读书周报》、《东方早报》、《新闻午报》及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

• 2009年6月3日

我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张隆溪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求异还是趋同:谈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的演讲,葛兆光教授主持。

• 2009年6月4日

我院许全胜副研究员作题为《读汉景云碑——兼论汉代美术》的报告,李星明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九场。

• 2009年6月5日—8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应邀赴西北大学作题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讲座。

• 2009年6月8日

我院组织第十一次博士后论坛,朱莉丽博士作题为《倭寇之乱下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的报告。

同日,我院召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提要撰写者召开会议,交流提要撰写的进展和经验,常务副院长汪涌豪教授主持会议。

• 2009年6月10日

访问学者杨俊峰博士作题为《封赐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的报告,李星明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

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十场。

• 2009年6月10日—11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在北京参加“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三次工作会议,其主持修订的《旧唐书》、《旧五代史》两史样稿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光明日报》6月11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 2009年6月13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参加“中国元素的诠释与演绎”论坛,发表题为《呈现中国:什么是中国风格》的主题演讲。

• 2009年6月17日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的讲演,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主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杜春媚来我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二十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的畅销伪书》。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应邀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为“东方讲坛”作题为《唐代文学的魅力》的讲座。

• 2009年6月18日—19日

我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三方合作举办的“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高知大学、天理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近20名学者参加会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我院学术委员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 2009年6月18日—20日

我院董少新副研究员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参加主题为“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下的季风亚洲与多元文化”的“第十三次人文联盟座谈会”,并发



表了题为《庞天寿考》的论文。

• 2009 年 6 月 21 日—26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阅读中国翻译史”暑期班,发表了“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内部史与外部史”的演讲。

• 2009 年 6 月 22 日

经我院在沪学术委员会委员初审、复审,第三批研究项目的十三份申请中,七个项目获得立项。我院组织了立项会议和开题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有葛兆光教授、汪涌豪教授、陈引驰教授、陈正宏教授和傅杰教授。

• 2009 年 6 月 23 日

访问学者杜春媚博士作题为《世界史视野下的辜鸿铭》的报告,王鑫磊助理研究员主持,此为“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十一场。

• 2009 年 6 月 24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到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为上海医科大学侨联十周年活动作题为《都市仍然繁华: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的学术报告。

• 2009 年 6 月 25 日

我院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举办“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小型学术讨论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艾尔曼教授主持。加拿大约克大学人文科学部及妇女研究学院季家珍(Joan Judge)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孙世伦(Wayne Soon)、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刘迅助理教授分别作报告。

• 2009 年 6 月 25 日—28 日

葛兆光教授、周振鹤教授赴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参加“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成立大会,并作题为《东亚文化与历史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的报告。

• 2009 年 6 月 27 日—28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日本关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西学东渐’现象的言语文化之研究”暨 CSAC 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泰西人身说概〉与“脑主记忆说”流传与影响》。

• 2009 年 6 月 29 日

我院组织博士后人员出站报告会,姚建根博士和慈波博士作出站报告,葛兆光教授、汪涌豪教授、陈尚君教授等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同意其按期出站。

• 2009 年 6 月 30 日

访问学者李妍承结束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并提交四篇研究报告。

• 2009 年 6 月

我院“复旦文史专刊”第一种《从周边看中国》由中华书局出版。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明末清初太仓地区的思想活动——以陈瑚、陆世仪为中心》一文发表在《国学研究》第 23 卷,其论文《事天与尊天——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也发表在台湾《清华学报》新 39 卷 1 期,均为国家“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

董少新副研究员的课题《从葡萄牙文原始文献看十七世纪的中国》获“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资助。□



我院资料室近日购进日文、英文、韩文书籍计43册，主要是境外学者关于中日、中韩关系史、中国宗教史、社会史以及韩国史方面的研究资料，包括韩国震檀学会编《韩国史》全七册、韩国东洋史学会编《韩国东洋史研究者论著总目录》、日本朝鲜史研究会《战后日本朝鲜史文献目录》等。其中日文专著20册，包括福永光司、渡边义浩、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我院资料室赠送有关西域、佛教专著及论文集11种，共16册。



封面题字 秦绍德

编 辑 杨 琴 肖 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 21 55665284
邮 箱 wsyjj@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